

揭秘麻栗坡日机残骸 80 载尘封往事

——“飞虎队”蒙自空战歼敌始末

唐学锋 李代祥



云南省档案馆保存的关于当年麻栗坡日机坠机调查的电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1941年，受邀来华的陈纳德将军组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面对当时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而日本法西斯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大举进攻之际，“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却在短短一个月内，以“12·20”（1941年）、“12·23”（1941年）、“12·25”（1941年）、“1·17”（1942年）四场空战的胜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打开了突破口。

其中“1·17”空战的丰富细节，逐渐从各种线索中浮出水面。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发现的日机残骸进一步有力地佐证了这一历史事实，对于今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进一步夯实中美民间友谊，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8月，笔者应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麻栗镇南油村邀请，至当地考察抗战时期曾坠毁于此的一架日机残骸事件。

2000年出版的《麻栗坡县志》对这次日机坠机的时间记载为“1942年冬”，除此之外，仅有“机上6人全部死亡”寥寥数语，再无更多具体描述。据当地亲历过的老人回忆：飞机掉下来的当天应该是当年冬月初三，前一天，也就是冬月初二，有相邻两个寨子的人正在办喜事。当天下午，当地驻军队和地方官员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赶到坠机地点，组织人员清理并封锁了现场。

而关于日机坠毁的准确日期以及坠机原因这些问题，因难以探究，数十年来已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

在档案中寻找线索

依常理推论，当地军政部门介入麻栗坡日机坠机事件调查后，理应留有相关调查报告。笔者去了麻栗坡县档案馆和文山州档案馆，均未能找到相关资料。但在云南省档案馆，在全宗号为“1111”的《云南省防空情报处》中一份叫“杨国钦等关于视察敌机落于云南麻栗山情形给萧处长电”的档案文件中却有所发现。

这是由当时的麻栗坡交通部电报局于1月18日下午4点（1942年）发出的一份电文，电文内容如下：

- 管局长、萧处长、文山传队长钧鉴：藤日（17日）午后，敌机落于麻栗山，前呈机在案，取即率兵前往视察，结果：
- 1.敌机钻撞石岩，起火爆炸，机落坡头。
 - 2.飞行员炸飞一人，跳出五人，足手跌断毙命，其形倭寇。
 - 3.炸弹爆炸一枚，落地未爆五枚。
 - 4.机身全毁。
 - 5.双翼，一翼断两节，一翼未断，国徽红太阳，号数：3087。
 - 6.发动机二个。
 - 7.废机（由）团二营监视。
 - 8.我方无损。

谨电奉闻，职杨国钦、刘应荣印，巧。这份珍贵的档案资料，将之前探究的麻栗坡日机坠毁时间定格为1942年1月17日，成为解开日机坠机之谜的重要线索。

随即我们又查阅了于1942年1月18日发行的《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国民日报》等报纸，对1月17日敌机入侵云南、并被击落一事均有报道，报道标题分别为《轰袭敌机惨败》（副标题为：美空军志愿队又建功）、《滇境空大捷》（副标题为：敌机昨晨轰袭滇全军覆没，我空军美志愿队又建功）、《轰袭炸机三架来袭，被我全部击落》（副标题为：一架空中爆炸，一架坠麻栗坡，另一架落屏边，机师一人在逃）。

其中《国民公报》的报道为：（中央社昆明17日电）敌轰炸机3架，今晨10时许袭滇，在蒙自上空与我空军美志愿队遭遇，当即展开空战，敌机3架全被击落，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司令今日下午发表特别公报称：今晨10点20分，我志愿队第3驱逐机（队）4架，在蒙自上空与来袭之敌机遭遇，空战结果，敌机3架全被击落，一坠蒙自附近，一坠屏边附近，一坠麻栗坡，我机全部安返。本日与敌机遭遇者，为副队长墨密尔，队员许森、奔特、海伍德。

在查阅《云南抗战文献史料选编——云南防空（下）》（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一书中，于《云南省八年来敌机空袭情况统计表》篇目中，对于1942年1月17日这一天有这样的记载：“敌机4架袭蒙自”、“美志愿队”击落敌机“2架”，敌“死10人”。综合各方资料佐证，我们基本弄清了于1942年1月17日在云南麻栗坡坠落的这一架日机的基本情况，即该机是在当天对我蒙自机场发动空袭过程中，被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在空中击中，坠毁于麻栗坡。

追溯事件缘由

关于当时蒙自机场被袭的相关情况，我们收集查询到相关资料记载如下：

1922年，时任云南省省长唐继尧下令在蒙自修建机场，选址在位于蒙自城东南约1.5公里的新安所西北面。机场建成后，唐继尧令人从法国购入两架双翼飞机，分别取名为“天马”和“银河”，飞行路线为昆明和蒙自之间。

据记载，该机场曾于1925年和1929年经历两次扩建，成为广州至昆明航线上的重要经停站，功能为满足客货运输之用。1938年蒙自机场再次扩建，工程竣工后，蒙自机场已成为一座拥有一条跑道长1200米、场面宽900米、占地面积823.9亩的机场。

1939年7月，当时的航空委员会在蒙自正式设立航空站。而蒙自机场战时正好处于日本空军轰炸昆明的必经航线上，该机场又是中国空军保卫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出击日军在缅甸、越南空军基地的重要根据地。故日军将它列为重点打击目标和对象。

据当时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在抗战时期，全省有21个县市遭到日机轰炸，其中遭受敌机空袭次数最多的为昆明，计59次、849架、被投弹2817枚；其次为蒙自，计27次、被投弹2606枚。

1939年1月，日军攻占广西泗洲岛，并在岛上修建机场。4月13日，日本海军第2联合空袭部队从泗洲岛起飞24架96式陆上攻击机，经越南老街和云南个旧上空，向蒙自飞来。这是自抗战爆发后，日机对蒙自实施的首次空袭。

此次日机空袭蒙自，计在车站附近投弹14枚、机场17枚、北门郊外37枚、市区37枚，死伤众多，炸毁及烧毁房屋1033间。当时的蒙自县长李宝楠代电称，“灾情惨重，目不胜睹。全城异常凄凉，商店闭门，食米及日用必需品均无从购买。遭此浩劫，人民流离失所，受害者生活已断绝，亟待救济而地方财力困难，半筹莫展实深伤痛”。

1941年12月7日夜至8日凌晨，日军偷袭了美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与此同时，由寺内寿一指挥的日本南方军（于1941年11月5日成立）约40余万人，分兵数路向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地发动了进攻。

为了配合南方军的进攻作战，日本大本营在1941年12月新设陆军第5飞行集团，下辖第4飞行团、第10飞行团、第10独立飞行队、飞行第16战队、第11运输飞行中队等作战部队，配备各种作战飞机150架。该飞行集团负责的作战区域包括中国的香港、广东、广西和云南，以及东南亚地区。

1941年12月20日，日本陆军独立第21飞行队在越南河内出动其下辖独立第82中队的10架99式双发轻型轰炸机空袭昆明，结果遭到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作战飞机拦截，当场被击落飞机3架。刚上任日本陆军第5飞行集团团长的小畑英良不甘心就这样败在飞虎队手下，但鉴于昆明防空力量的强大，又不敢轻易再犯，遂将报复的对象选定为飞虎队在蒙自的基地。

殊不知，等待他们的同样是失败的下场。

还原空战现场

据收集到的有关文字资料记载：1942年1月17日，小畑英良下令第4飞行团出动下辖第14战队的3架97式重型轰炸机空袭蒙自。为了保险起见，又以第50战队的3架97式战斗机担任这次空袭行动的护航任务。

当时，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正不断地攻城略地，并取得战略优势，因而日军飞行员根本未将中国空军和飞虎队放在眼里。担任护航的战斗机与执行空袭任务的轰炸机之间并没有制订周密



飞虎队第3中队飞行员在P-40战斗机前合影

密的配合计划，日军的战斗机起飞后自始至终未在空中找到其应该掩护的对象。而陈纳德将军早已在云南境内建立起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防空监测体系，敌机从越南一入境就被我方探测到。很快，位于昆明的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作战指挥室里，所有参谋聚集在地图面前，随着前方将敌机飞过的地名在地图上连线标出敌机的飞行航线，很快得出结论：敌机此行轰炸的目标为“蒙自”。

随后中国空军第5路司令部司令长官王叔铭立即向驻守昆明的飞虎队下达作战命令，以其第3中队（编号“地狱里的天使”）的9架P-40战斗机，于10点05分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前往蒙自附近拦截敌机；以第1中队（编号“亚当与夏娃”）的9架P-40战斗机，于10点20分起飞，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上空巡逻警戒，防止敌机乘虚进入昆明上空实施轰炸。

10点05分，飞虎队第3中队的9架P-40战斗机准时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10点20分，正在空中飞行的飞虎队第3中队收到地面指挥部发出的作战命令：已查明此次空袭蒙自的敌机为3架。敌机机身上部分涂装成土灰色和绿色，下部分为天蓝色和灰色；其机翼上下均绘有红色圆形图徽；尾翅则漆有红白相间的条纹。3架敌机排成V字形队形飞行。发现敌机后，飞虎队的4架战斗机从敌机后方高空俯冲下去，向敌机展开攻击。

此次空战，敌我双方飞机于蒙自东北上空相遇，敌机遭遇我机攻击后，即向东南方向折返飞行。由于这是一场空中追击战，故这次空战发生的地点不仅是在蒙自的上空，随着敌机的南逃，在敌机进入文山州的丘北、砚山、西畴、麻栗坡等地上空均发生过空战。

之后，中国空军得到丘北县和麻栗坡县政府的来电，称发现了被击落的两架敌机。据丘北县政府的报告，在丘北县

被飞虎队击落的这一架敌机坠落的具体地点为盘茶乡石云坡，其机身全毁，机内4人均毙命，依据尸身所佩符号，能分辨身份的有三木大尉和清野伍长两名，另有地图、机枪和防毒面具等物。

另对照日方资料所记载：在丘北县盘茶乡石云坡坠落的那架日机，其驾驶员的确是三木大尉（应为这次空袭行动的指挥者），在麻栗坡附近坠落的那架日机，其驾驶员为广中中尉。由藤吉驾驶的第三架97式重型轰炸机，亦在空中中遭受重创，其机组人员受重伤。

为了隐瞒这次空袭行动的重大败绩，日本空军向上报告称：当天，第14战队的飞机遭遇到中国方面10余架P-40战斗机（实际仅4架）攻击，其在空战中击落中国方面战斗机3架。

至此，尘封数十年的秘密被揭开。经过多方调查搜集相关资料梳理后得知，在云南麻栗坡发现的日机残骸，是1942年1月17日被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在蒙自空战中击落的一架日机，该机为一架97式重型轰炸机，属于日本陆军第5飞行集团第4飞行团第14战队，驾驶员为广中中尉。

探寻佐证这一尘封的历史，一方面有助于梳理明晰抗日战争时期的相关历史事件脉络与历史实物之间的确切关联，便于我们在史实整理过程中更为完善、全面地展现历史面貌；另一方面，通过大量的史料和文献勾勒出当年中美联合作战的情景，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中美两国为争取和平而携手合作的光辉历史和战场友谊，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关注史实，从而珍爱和平。

守护和平不分国界，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目标，它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结下珍贵的友谊……

（作者唐学锋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李代祥为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城南中学历史教师）

铜鼓：民族历史研究的活化石

李松



万家坝型铜鼓

以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命名。体型与鼓面较小，鼓胸膨胀，器表粗糙，或通体无纹，或只有简略的花纹。流行年代约为春秋初至战国早期（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当时的濮人与骆越人是这种类型铜鼓的创造者与使用者。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铜鼓就出土于楚雄万家坝古墓葬。

石寨山型铜鼓

石寨山型铜鼓是以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葬群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其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纹饰多为写实性纹样，反映了我国古代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同时也表现了铜鼓铸造技艺日臻完善，进入了发展阶段。此型铜鼓流行于云南晋宁、四川会理、贵州赫章、广西玉林等广大地区。其流行时代始于战国初期至东汉初期，前后延续500多年，铸造和使用此类铜鼓的民族为当时的滇、夜郎和骆越等。



冷水冲型铜鼓

以广西藤县横村冷水冲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流行于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晚期到12世纪的北宋时期的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和左江、右江、郁江、黔江、浔江流域一带。铸造和使用此类铜鼓的民族是同时期居住于上述地区的僚人。此类铜鼓形体瘦高，鼓体较大，花纹密集而趋于图案化，饰有变形翔鹭、变形羽人和变形龙舟纹，重要特征是鼓面四周铸有蛙饰和鸟兽、人物等立体造型，奇异多姿。冷水冲型铜鼓为石寨山型铜鼓的继承和发展，标志着铜鼓铸造工艺进入了成熟阶段。



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馆藏珍品中，有一类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青铜器——铜鼓。铜鼓是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一种由青铜铸造的打击乐器，主要用来演奏音乐或舞蹈伴奏，最开始是作炊器之用（即釜），后来演变为打击乐器，用在歌舞、庆典、祭祀等特殊活动中以及古代用来指挥军队进攻之用。

在古老的传说中，敲响铜鼓，不仅可以与天地、神灵沟通，还能保佑乡寨平安，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铜鼓得以再现于世。每一面传世铜鼓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它们不仅记录着民族生产、生活的过程，更是民族的精神符号，是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活化石。

出土的铜鼓以铜合金铸造而成，由面、胸、腰、足、耳五部分构成，基本形态是体如圆墩，平面曲腰，中空无底，遍体花纹，两旁附耳，集乐器、礼器、重器功用于一体，堪称反映民族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滇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鼓，作为滇池地区青铜遗存中最具特色的四大器物（铜鼓、贮贝器、铜俑、青铜扣饰）之一，铜鼓也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依据型制和纹饰特点，中国古代铜鼓划分为八大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其中以石寨山型的铜鼓最为精美。下面我们就分别对这八类铜鼓进行鉴赏：

北流型铜鼓

以广西北流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其特点是体形厚重硕大，面径最大者达165厘米，最小的也超过50厘米。鼓面伸出鼓径外，大于鼓胸，部分鼓的面沿下折形成“垂檐”；鼓胸微凸，最大径偏下，略呈斜直；鼓腰呈反弧形，胸腰之际以一浅槽分界，附以耳环两对，少数鼓附偏耳，或在两对大耳环之外另附两个小耳环。其流行年代为西汉至唐代，主要分布在桂东南和粤西南地区，以北流、信宜一带为中心，铸造和使用此类铜鼓的民族是古代的乌浒、俚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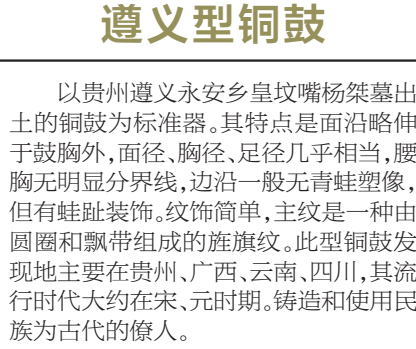
灵山型铜鼓

灵山型铜鼓是以广西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主要流行于公元3世纪东汉末年起到10世纪隋唐时期的两广地区。这种铜鼓与北流型铜鼓型制相近，鼓面大于胸，鼓胸较为平直，鼓面花纹精细，多为云雷纹、线纹和鸟纹等纹饰，但鼓面无立体蛙饰，常铸有三只脚踏蟾蜍六只。铸造和使用此类铜鼓的民族是古代岭南的乌浒、俚人。



麻江型铜鼓

以贵州麻江县出土的铜鼓为标准器。其特点是体小而扁矮，面径略小于胸径，边沿略伸出胸外，鼓身中部凸起棱而分成上下两节；主晕纹饰多见旌旗纹，有的配以十二生肖等。此型铜鼓分布范围较广，湘西、云南、四川等地都有出现。其流行时代始于南宋，历经元、明、清各朝，直到近代的南方一些少数民族还在使用。铸造和使用此类铜鼓的民族有我国的壮、布依、侗、水、黎、苗、瑶、彝、白、土家、仡佬等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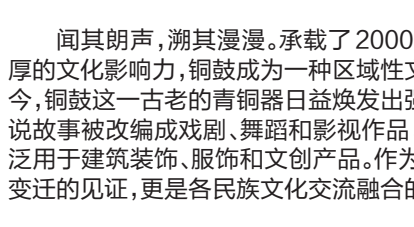
遵义型铜鼓

以贵州遵义安乡皇坟嘴杨寨墓出土的铜鼓为标准器。其特点是面沿略伸于鼓胸外，面径、胸径、足径几乎相当，腰胸无明显分界线，边沿一般无青蛙塑像，但有蛙趾装饰。纹饰简单，主纹是一种由圆圈和飘带组成的旌旗纹。此型铜鼓发现地主要在贵州、广西、云南、四川，其流行时代大约在宋、元时期。铸造和使用民族为古代的僚人。



西盟型铜鼓

以云南西盟山区佤族使用的铜鼓为代表。其特点是体形高瘦，鼓面宽大，身近直筒形，胸、腰、足无分界标志。此型铜鼓分布在云南西南部地区，以及邻近的泰国、老挝和缅甸等国家，广西的龙州和靖西也有少量发现。其流行时代始于唐代中期至清代末期，历史上使用这类铜鼓的民族，在中国境内是傣族、佤族，在东南亚地区有泰国的泰族，缅甸的克伦族和老挝的卡族。云南一些民族村寨仍在使用。



闻其朗声，溯其漫漫。承载了2000多年的历史密码，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影响力，铜鼓成为一种区域性文化现象和多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而今，铜鼓这一古老的青铜器日益焕发出强大的文化和艺术生命力，与铜鼓相关的传说故事被改编成戏剧、舞蹈和影视作品，获得广泛关注；铜鼓的符号和图案更是广泛用于建筑装饰、服饰和文创产品。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铜鼓不仅是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见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桥梁和纽带……

（作者单位为：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